# 袁瞿党争及其对清末宪政改革的影响

程为坤

袁世凯与瞿鸿禨两党之间的交讧，曾经引发震动晚清政局的“丁未政潮”，因此历来为治清史者所重视。不过，以往很少有人将这场斗争与清末的筹备立宪联系起来考察。最近，有的文章从统治阶级内部立宪与保守两派斗争的角度，对这个问题重新作了论述①，但是其观点笔者却不尽赞同。笔者认为，袁、瞿两党之间，既不单纯是清与贪或者墨与墨之争，也难以用新与旧或立宪与保守之争来概括，应该说，这是清朝统治阶级改革派的内讧，是改革派中的两部分人为了争夺权势而进行的倾轧与角逐。它削弱了改革派的力量，从而对清廷的筹备立宪产生了消极影响。以下，拟就这一观点略作探讨。

一、袁、瞿两派都是“新党”或“立宪派”。

袁、瞿两党多是经过辛丑年间清廷对顽固派大清洗后所保留下来的官僚，思想比较开明，主张仿效西方，改革封建弊政，走近代化强国的道路，以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因此，属新洋务派范畴。如果将其代表人物袁世凯、端方、瞿鸿禨、岑春煊的政治态度作一比较，则不难看出，他们在改革、立宪等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

首先，这几人在戊戌变法时期皆附会新潮，同情或支持过康、梁维新派。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痛感时局阽危，在朝野上下掀起维新变法的波澜。袁、端、岑、瞿一帮官吏中较有见识者，也敏锐地觉察到改革已成大势，敬天法祖，墨守成规不能适应时局，于是纷纷与康党联络，作出维新姿态。袁世凯不时探访康、梁，大谈练兵变法，参加强学会，捐银五百两。端方也与康、梁周旋，得充百日维新期间所设立的农工商局总办。岑春煊“戊戌服阕入京，结交康党，入保国会，慷慨上书，急欲一试，遂由候补京卿外简广东布政使”②。瞿鸿禨“戊戌前，皆尝与康有为、梁启超款曲，……辛丑间犹力举康梁，并请解党禁”③当时，这几人均受到顽固派攻讦，被视作康、梁同党。在慈禧一伙卷土重来后的复旧恶浪中，他们为了自保而出尔反尔，急于和维新派划清界限，政治上一度动摇与倒退。但不能否认，他们多少受到维新思潮的薰染，开始从保守的封建官僚阵营中分化出来，露出倾向变革的端倪。

其次，他们均鼓吹、赞襄或推行新政，以洋务派的后继者自居。庚子以后，清廷迫于内忧外患，企图靠实行新政以自救。一时间，猖獗政坛的顽固派被铲除殆尽，而袁、端、岑、瞿等新洋务派的干将则受到重用，成为推行新政的骨干。袁世凯继任直督后，编练北洋新军，兴办实业，创建巡警，废科举，办学堂，成了实施新政的楷模。端方在湖南的新政也办得条理井然，有声有色。岑春煊庚子年间护驾西行时，即向太后“力陈兴教育、明赏罚诸大端”④。后来在任川督的九个月间，整饬吏治，清理财赋，大兴教育，筹练新军，“积弊悉除，百废并举”⑤。瞿鸿禨“辛丑谒于行在，与论变法次第，颇称予通郡邑利病”⑥。入军机后，“对于新政方面，握有大权”。同值诸军机，皆老耆昏瞶，朝廷关于改革的各项旨

令，多数出于瞿氏手笔⑦。纵观袁、瞿等人在新政中的表现，看不出彼此之间有新与旧的区别。

第三，他们都结交资产阶级立宪派，并接受后者的影响。由于袁、瞿两派均标榜自己开通明达，辨识时务，加上戊戌年间与维新派的历史关系及新政期间的积极表现，因此被资产阶级立宪派视作可以争取的对象及推进宪政的靠山。而前者也十分重视后者的改革建议，当作自己左右局势、鼓吹立宪的张本。袁世凯虽然在维新期间开罪康、梁，但他与张謇的交谊却得以恢复。一九〇四年，张謇为了发动立宪运动，主动修书袁氏联络感情，请他赞成宪政，袁答以"尚须俟时"⑧。翌年，张又去函敦促，袁权衡利弊得失，转到立宪立场，鼎力促成清廷下诏预备立宪。端、岑则与康、梁及张、汤两派皆有厚交。庚子以后，端方与梁启超通信不断，请梁代草奏请立宪、宽赦党人、考察政治一类的奏疏二十余万言。一九〇六年考政归国，在上海与张謇经常商讨立宪进行之策。岑春煊则在预备立宪公会成立时捐款一万元予以支持⑨。瞿鸿禨与江浙立宪派人的关系更为亲密。他在担任浙江、江苏学政期间，曾先后录取了汪康年、汤寿潜、陈黻宸、张美翊等人为举人、进士，后者则自列门墙，利用师生关系通信联络，请他向朝廷代达立宪的主张⑩。尽管袁、瞿两党势同水火，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朋友和支持者，则似乎是相同的。

第四，他们都在朝中积极鼓吹立宪，对清廷实行预备立宪起到促进作用。日俄战争后，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鉴于立宪小国日本打败专制大国沙俄的教训，且迫于革命烈火的蔓延及立宪派舆论的压力，开始倡言立宪。其中，袁、瞿诸人，又成为佼佼者。袁世凯于一九〇五年七月奏请朝廷十二年后实行宪政，并简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他和端方成日向慈禧宣传立宪的必要性及好处，语颇动听。时任粤督的岑春煊也积极赞成宪政。一九〇四年，他与张之洞、周馥率先以立宪入奏。次年底，端方曾以立宪事电商各省督抚，"岑督以立宪年限太远，拟请改速"⑪，态度格外激进。瞿鸿禨历来被当作立宪的反对派，其实不然。一九〇六年九月廿四日《大公报》载："闻此次宣布立宪，……其热心斯事极力赞成者，则唯瞿、徐两大军机之力为独多"。⑫证以新近发现的《瞿鸿禨朋僚书牍》一书，此说当为事实。据汤寿潜一九〇五年六月致瞿氏函称："造膝密陈，而有四大臣之遣，中国幸福，孰大于是"。可推知清廷决定派员出洋考政与瞿氏劝说慈禧有关。又范源濂在清廷发布预备立宪诏书后致瞿氏函称："中国今日为从古未有之事局，赞襄立宪，为从古未有之功名，柱石擎天，薄海钦仰"。汤寿潜同时也有函说道："吾师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折群言之衷，任天下之重，狂飚怒潮，系于一柁，过了此关，基础已具……非吾师孰纲维是"。誉瞿为赞襄立宪的"柱石"，将他喻作此次决策中掌柁提纲之人，颇能说明他的正面作用。尽管这些话不乏门生对于恩师的溢美之辞，但还是有力地反映了在清朝宪政改革初期瞿氏赞成立宪的立场和态度。

既然袁、瞿两派的主要人物政见没有根本分别，那么，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这是根源于双方权力地位的冲突。一九〇三年荣禄死后，奕劻继为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通过贿赂收买，与他结为死党，使北洋集团的势力急骤扩张，这就对瞿鸿禨和岑春煊这两位不愿附就庆、袁的重臣形成了潜在威胁。瞿以文敏负清望，岑以扈从西安有功，均受慈禧宠信，因而能够并敢于和庆、袁相抗。"相传世凯初求媚于鸿禨，尝自言当修门生之敬，瞿拒之，继又请为昆弟交，亦不纳，鸿禨为次子授室，世凯复命北洋公所致贺仪八百金，亦谢却之，袁既见绝于鸿禨，遂不得不谋排挤矣"⑬。奕劻与瞿鸿禨同值枢垣，常

因袒护或压抑北洋集团而起冲突，二人由是积不相能。岑春煊久不直袁氏所为，蓄取而代之之意，又曾与端方因争夺陕西巡抚而结仇，且清刚自励，弹劾贪墨，参罢若干奕劻私人，与奕也成政敌。于是，袁、庆、瞿、岑“各树党援，互相挤排”⑭。从双方的实力对比分析，袁派形成较早，人多势众，而瞿派临时结合，人少势单。前者有北洋军政势力作后盾，后者则延揽御史清流壮声威。此后，两派斗争的形式及内容时而变换，但交争的核心，仍然不出一个“权”字。

二、瞿鸿机与守旧势力的结盟及官制改革的失败。

清廷的宪政改革，由于包括机构的调整、权力的分配及人员的变动，因此为封建官僚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创造了机会。袁世凯要借助改革扩充权势，瞿鸿机则怕丢掉禄位转而反对，双方由宪政的共同支持者分化成主张或抵制官制改革的对立两派。

初，清廷选派大臣出洋考察，庆、袁授意徐世昌提名瞿鸿机，思谋将其排出军机处，但被瞿托辞年老难行而拒绝，双方的恶感因此增加⑮。一年后，清廷的官制改革开场，旨派载泽、世继、荣庆、袁世凯等人共同编纂改革方案，由庆王、瞿鸿机、孙家鼐总司核定。这是预备立宪的首要步骤，然而袁、瞿所关心的却是怎样利用这次官制的变动巩固自己并削弱对方。

袁世凯对官制改革格外热心，考政大臣端方、戴鸿慈所上的厘定全国官制的疏稿，即由他所提供。当慈禧阅奏后踌躇不决时，又是他专程赶到北京，“奏言变法须先组织内阁，组织内阁须先从官制入手”⑯，因而说服了慈禧。袁氏的如意算盘有三：（1）鉴于慈禧耆迈，恐光绪复位后修戊戌旧怨，“思藉立宪之名，剥夺君权，尽归内阁”⑰；（2）设责任内阁，推奕劻当总理大臣，自己当副总理大臣，掌握用人行政的全权；（3）裁撤军机处和旧内阁，剪除瞿鸿机等异已分子，由已党组阁。为了保证官制改革的成功，他还动员了奕劻、载泽、端方、徐世昌、张百熙、世续等一班人马，组成改革派，轮番对慈禧灌输宪政知识及改革的益处，并且在官制编制局安插了大批亲信，直接操纵整个编纂工作。

本来，资产阶级的责任内阁就是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的限制，况且改革官制又将裁撤及调整部分机构，这就触犯了守旧大臣及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满汉官僚，势必导致他们的反对，反对派当中，由于泥古不化、维护君权而抵制新官制的占多数，其代表人物是孙家鼐、鹿传霖，荣庆、陆宝忠等。本对宪政并无成见、但因官制更动将损及自己利益、且不愿自己的政敌乘改革而发达、因此转向反对的有瞿鸿机和铁良⑱。瞿鸿机知新官制若行则自己的军机大臣及外务部尚书难保，于是暗思抵制之方；铁良因“力主中央集权、伸满抑汉主义”⑲，担心汉族官僚袁世凯的势力凌驾于满族亲贵之上，也千方百计地拆台。他们终与守旧派结成对抗官制改革的联盟。

不久，在奕劻等人支持下，袁世凯一手炮制的中央官制草案在编纂会议上通过。其关键内容，即设立责任内阁，掌握全国行政，由总理大臣一人、副总理大臣二人负责。将原有的军机处及内阁裁去。随后，袁世凯的亲家、尚书张百熙又上疏密保奕劻为总理，袁为副总理。这样，袁氏借官制改革而揽权营私的野心昭然若揭，引起朝野舆论大哗。

瞿、铁一派闻讯，立即组织攻击。第一步，授意御史，交章弹劾。报载：“裁都察院之议起，台谏人人自危，加以枢垣各有所授意，谓上头意思，本来活动，尔等有话只管说。于是参奏改制每日必数起，皆发交编制大臣阅看。大旨皆攻破组织内阁之说，绝无一折为改革党之助者”⑳。第二步，挑唆内监，向慈禧请愿。传闻在讨论官制时，袁世凯曾倡议裁去太

监，瞿、铁遂鼓惑李莲英等人从中作梗。“一日，太后出，太监百余人环跪哭求，谓外间均欲逐去奴才等，乞老佛爷念奴辈服侍已久，开恩赐留。太后惊诧，谓我未听见有此话，他们必须逐去尔等，是太与我过不去，此亦阻力之一大原因也”㉑。第三步，亲自出马，在太后面前诋毁袁世凯及新官制。铁良性情暴烈，自宣布立宪以来即与袁公开为敌，“不特于根本上大相反对，即枝叶事亦各持异议”㉒。“闻有密奏该督遇事跋扈，广布羽党，各省要差，皆其私人，居心叵测等语”㉓。瞿鸿禨则机诈权谋，表面上对新官制草案不加可否，背地里却向慈禧密陈，说什么责任内阁成立，一切大事均由国务会议决定，皇太后将大权旁落㉔。以此来激怒权势欲极强的慈禧。第四步，将端方遣出北京，分化袁党势力。端方自欧归国，志高气盛，有取代瞿鸿禨外务部尚书之心，“值宪法议起，与项城同在都城，会定官制，互相标榜”㉕；“铁良因取中旨，出端方为两江总督，以孤其势”㉖。

面对瞿、铁一派的明枪暗箭，改革党也竭力抵御，并伺机反攻。袁世凯召见时，提出“将太旧之大臣或令退仕或设元老院以位置之”㉗，并且雄心勃勃地表示：“官制一日不定，臣一日不能回任”㉘。载泽上密陈大计折后，受到反对派御史的围攻，“大愤，递折参劾某军机（指铁良）等挟私见持偏论以阻挠立宪”㉙。张百熙也在奏对时说：“若不大行改制，恐无以餍人民之望而生他变”㉚。但是，人言可畏，众口铄金，反对改革的言论使慈禧对袁世凯等人产生了猜疑，结果，十一月六日发布的厘定官制上谕，否决了草案提出的责任内阁制，原军机处及内阁仍予保留。根据新官制规定，军机大臣不兼部务，惟可兼管外务部，除了庆王、瞿鸿禨外，其他军机均被迫退出。瞿氏又趁机引荐广西巡抚林绍年入军机，作为助手，地位更为稳固。又新官制主中央集权，规定外交、财政、军事及轮电路邮归各部管辖，袁世凯被迫辞去各项兼差，交出北洋四个镇的兵力。他攘夺内阁实权的野心不仅未能实现，而且原有的权力也大见削弱。

官制改革因此而失败了。这不仅是守旧势力战胜了改革派，也与统治阶级立宪派的分裂互斗有关。没有瞿、铁的大事阻挠，保守势力难以得逞，而慈禧太后也不一定会改变初衷，因为她事先已从袁世凯、戴鸿慈、端方等人的奏陈中了解到官制改革应设责任内阁的内容。当然，袁世凯为自己所设计的责任内阁，既不像英国的内阁，对国会负责并受其监督，也不同于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内阁，起辅弼天皇执行政务的作用。他的内阁，一方面脱离国会的监督，另一方面又侵夺了皇帝的大权，因此是一种独裁主义的内阁。不过，从官制改革来说，它毕竟是仿效西方资产阶级宪政制度、改变几千年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一次尝试，有利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瞿、铁等人因私利而牺牲宪政改革，与顽固党人沆瀣一气，对改革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我们不能不多加谴责。

三、袁、瞿两党的进一步倾轧及丁未政潮的影响。

如果说，在变更官制阶段，袁、瞿两党的斗争，以改革与否为内容，那么，在丁未政潮中，双方的身份，似又颠倒；瞿、岑等人扮演清官角色，对受贿鬻官、结党营私的庆、袁一党，大举参劾；而袁党也不再顾忌自己的“开明派”、“立宪党”名声，将瞿、岑与立宪派康、梁诸人的关系，作为置政敌于死地的罪状。双方的交战，达到白热化程度。

有关丁未政潮的情节已为人们所熟知，这里无庸赘言，只是有两点需要补充和强调。

其一，是瞿、岑勾结及其与报馆台谏的关系过去不大清楚，这里作些说明。据载：“时庆、袁相比，惟忧西林（春煊字）为梗。政府诸公，处覆巢之下，转危为安，亦惟西林是冀。临桂于晦若（即于式枚）侍郎入都议宪政，见善化，以意私焉。善化欣然从之，西林以

密电书本为赠，二人之交自此始”㉛。观此，可知岑、瞿订交在预备立宪宣布之后，岑为主动，牵线人是于式枚，目的纯为对付袁党。当时，仅靠瞿、岑二人的力量倒庆、袁是不够的，因此，他们十分注意联络敢言的报纸和御史清流。在北京主办《京报》的汪康年是瞿鸿机门生，二人过从甚密，据说瞿对该报有所资助，甚至占有报馆股份㉜，因此《京报》无形中成了他的喉舌。至于后来卖力攻揭庆、袁的“台谏三霖”，赵启霖是瞿鸿机学生，赵炳麟是岑春煊同乡兼挚友，江春霖也与瞿、岑交厚。一九〇七年五月发生的所谓“杨翠喜案”及倒庆浪潮，可以说完全是由瞿、岑蓄谋策划及导演的。五月初，奉旨调补四川总督的岑春煊突然北上入都，赵启霖受瞿派遣，“迎至保定定计”㉝。岑“是晚达都，即招其同乡赵侍御炳麟入商一切，善化（即鸿机）往候，谈甚密……计岑尚书到京三、四日，无一日善化不来密商也”㉞。待瞿、岑、赵等人步骤已定，首由岑春煊发难，在慈禧召见时请留京供职，旨下，补授邮传部尚书，未经莅任，即劾罢党于庆袁的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又于奏对中屡言奕劻贪黩误国，应予罢黜。接着，《京报》披露了署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购歌妓杨翠喜献与奕劻之子载振及以十万金贿赂奕劻的丑闻，御史赵启霖据此抗疏参劾，赵炳麟、江春霖也相继上疏声援，一时朝野诋庆的声调甚高，庆、袁人马慌恐不安，有冰山将倾之虞。袁世凯描述这一情况说：“大谋（指岑）发端，群伏响应，大老（指奕劻）被困，情形甚险”㉟，显然是这场“倒庆战”的简捷、准确的记录。

其二，是关于瞿鸿机开缺的原因，过去有些著述比较看重他泄密一事，认为他把奕劻将要免职的消息透露给外国报纸，被庆、袁抓住把柄、买通恽毓鼎以瞿氏“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名入奏，适中慈禧所忌，因此遭黜。其实，情况远比这要复杂。瞿氏失宠的根本原因，是在庆、袁挑拨下，慈禧怀疑他勾结康党，阴谋归政。庆、袁深知瞿鸿机眷隆难撼，只有用归政一说，方能打动太后。瞿、岑在戊戌年间与康、梁交往及庚子后请解党禁等情，慈禧是知道的，适岑春煊此次进京，又保荐立宪派人郑孝胥、张謇，而杨翠喜一案中，汪康年等立宪派的报纸攻击奕劻父子的言论，与御史参折的内容如出一口，于是，奕劻在五月廿七日的独对时，“遂持以耸动孝钦，大抵以瞿、岑外结党人报馆，主谋在归政为词。浸润既行，乃借题以发之矣”㊱。这些证据原本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但慈禧最恨康党和害怕归政光绪，闻奕劻这通胡诌，不免将信将疑，因而对瞿鸿机隐生不满。所以事后袁世凯向端方不无得意地密报：“大老决不能动，同班中或不甚稳耳”㊲。已经透出瞿将开出军机的信息。不久，袁党故伎重演，伪造一幅岑春煊与康、梁合拍的照片呈上慈禧，作为岑通党图乱的佐证，以此将岑的底缺开去，也可以说明正是串通康、梁、企图归政的罪状，使瞿、岑失去了慈禧的宠信而被罢免，恽毓鼎的参折不过是慈禧为处分瞿氏而找到的一个借口而已。此外，泄密一事，也有背景。奕劻的贪墨庸俗，慈禧并非不知，但一直不能罢斥他，就在于庚子议和时他取信于洋人，得到后者庇护。慈禧向瞿鸿机谈到更换奕劻或许只是她的愿望，不一定可能实现，而瞿氏却信以为真，将这消息泄露给外界，使慈禧遭到英使夫人的质询。如果说慈禧为此事而发怒，那也不是因为瞿氏口风不严，而是恨他把自己摆到与列强作对的立场上。总之，瞿鸿机开缺的原因，一是慈禧疑心他参予了康党复辟光绪帝位的密谋，二是他让慈禧承担了触怒列强的风险。

那么，袁、瞿党争及丁未政潮对清廷的筹备立宪产生了何种影响呢？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

第一，削弱了朝廷内部立宪一派的势力，干扰了宪政改革。我们知道，清政府的宪政改

革是新政的继续和发展，它标志着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涉及到改革的核心——政治体制的变更。这一举动的成败，关系到清王朝能否摆脱危境，得以自救，因此它成为当时中外瞩目的一个大问题。然而，宪政改革肇始之际，朝中立宪派的骨干重臣之间，却发生了内讧。瞿、铁的退出立宪阵营及与守旧结盟，破坏了官制改革，延宕了预备立宪的进程。随后，袁、瞿两党又置宪政改革于不顾，倾全力撕拼，结果是瞿、岑两名新派的要员被摈出政府。瞿、岑走后，惯于搞权力平衡、利用臣下之间的矛盾居间操纵的慈禧对袁世凯坐镇北洋放心不下，因此以中枢乏人为理由，将袁世凯与张之洞一起调入军机，实际上是明升暗降。清代的军机处，是皇帝的秘书机构，缺乏独立职权。“袁在军机，所有一切政令，都是禀承谕旨，没有单独发表的事件”㊴。他与张之洞在立宪中的作用，自然比任封圻时减轻了许多。这一时期，虽有《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但这部“巩固君权之宪法大纲”，与其说是出于袁、张等枢臣的谋划纂拟，还不如说是直接反映了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族统治者集权皇室的意图。所以，不像有人认为的，瞿、岑的下台及袁、张的入主枢垣，开创了清朝预备立宪的新局面，恰恰相反，它意味着统治阶级立宪势力的削弱及宪政改革陷入了危机。

第二，为满族少壮亲贵集团的得势创造了条件，终致筹备立宪的破产。经过丁未政潮，慈禧太后对于庆、袁勾结、把持朝政的情况有所了解，由于列强干预等原因，奕劻未遭罢免，但慈禧却让醇王载沣入军机加以牵制。这样，就给满族亲贵少壮派的兴起提供了良机。本来，善耆、载泽、载涛、载洵、毓朗等人均对袁党的飞扬跋扈及北洋势力的壮大十分不满，碍于慈禧的宠信，他们也无可奈何。迨载沣上台，特别是光绪、慈禧的去世及载沣的摄政，使他们感到剪除袁党的时机已至。一九〇九年一月，清廷以足疾为名，将袁开出军机。同年，张之洞病逝。不久，刚接直督的端方又因照相违制坐免。同时，北洋一大批军政要员被贬的贬，罢的罢，元气大伤。这是清朝内部继丁未政潮后的又一次大倾轧、大内讧，主张宪政的官僚们无形中受到再次打击。袁、端、张的罢死，奕劻、世续等人与载沣拆台，导致朝中立宪派群龙无首，宪政改革主持乏人。而载沣原本对立宪不感兴趣，他所以还挂着宪政的招牌，是为他推行从德皇威廉处学来的皇族集权的经验作掩护。因此，当他和兄弟伙揽尽海陆军大权并拼凑出一个皇族内阁时，天下人对清政府改革的幻想就随之破灭了。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革命救国的道理，筹备立宪终于名存实亡。可见，丁未政潮与清廷宪政改革的失败虽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它的间接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

---

①迟云飞：《预备立宪与清末政潮》《北方论丛》1985年第5期。

②胡思敬：《国闻备乘》。

③㉟㊱㊲㊳《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55—56页。

④岑春煊：《乐斋漫笔》。

⑤《蜀海丛谈》。

⑥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

⑦㉔刘厚生：《张謇传记》。

⑧《啬翁自订年谱》。

⑨《郑孝胥日记》。

⑩《瞿鸿禨朋僚书牍》（钞本）。

⑪《立宪意见不同》《大公报》1905年12月7日。

（下转第61页）

性格的扭曲导致了个人功业的相反结果。

撰写史传，无疑要写传主的活动、功业；要写传主的历史地位。但如果只写这些“事迹”，还只是表层文章，还不是一部好的史传。一部好的史传应该写出传主的思想情绪、性格心态，要写出深层文章。大传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奕䜣的这个层次，写他的志向、抱负、识见和遭遇，写他的欢乐和忧伤、顺境与逆境，因而使全书有思想，有深度和厚度，令人读来回肠荡气，引发深沉的思索，从中得到启迪和教育，的确不失为一部写得颇有特色的好书。

《恭亲王奕䜣大传》描述了传主生平的各个侧面，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的近代改革家的形象。此外，书中的许多论断立意颇新，可为一家之言。至于这位改革家的形象塑造得是否牢固坚实，是否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书中颇具新意的论断是否经得起检验，能否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则有待于史学家的鉴别和评论。

---

（上接第31页）

⑫徐指徐世昌。

⑬沈云龙：《谈袁世凯》，《现代政治人物述评》第61—62页。

⑭《觉花寮杂记》卷1。

⑮李宗侗：《五大臣出洋与北京第一颗炸弹》，《传记文学》卷4，第4期。

⑯㉖胡思敬：《大盗窃国记》。

⑰胡思敬《审国病书》。

⑱铁良原是赞成立宪的，一九〇四年南下视察时曾多次与张謇研求宪法。一九〇五年入军机处后，又促成清廷派员出洋考察政治。参见《张謇日记》、《张謇存稿》。

⑲《汇报》第9年，第51号。

⑳㉑《时报》1906年11月8日。

㉒《改订官制各大臣现象》，《汇报》第9年，第72号。

㉓《要闻》，《汇报》第9年，第92号。

㉕㉛㉝刘体智：《异辞录》。

㉗《要闻》，《汇报》第9年，第67号。

㉘《要闻》，《汇报》第9年，第73号。

㉙《各大臣对于改革官制之意见》，《时报》1906年9月30日。

㉚《枢府新谈》《汇报》第9年第84号。

㉜1907年6月27日《时报》载：“瞿于□报馆实有股份，组织之者为贵阳□氏，湘乡□氏，钱塘□氏也，故名之曰四集公司印字馆，谓瞿□□□四人集合而成也。闻有人密买通瞿之仆人及其幕友‘确得瞿与□报往来信札，查得真凭实据，然后下手，故折中第一条款即牵及朱氏，语语徵实，非有卖家奴为之和盘託出，断不能逮得真相也。”按“钱塘□氏，指汪康年，汪籍贯浙江钱塘（今杭州），“□报馆”者，实指《京报》馆也。

㉞《时报》1907年5月16日。